

少  
雨

# 多餘的黏

——大叛徒瞿秋白

的白白

编者按：

周总理一九六六年八月卅日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时说：“瞿秋白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了他到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没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把碑给砸了，碑上有我的题字，我当时认识不清。知识分子官僚出身的瞿秋白像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

现在我们把大叛徒瞿秋白的自白翻印出来，供同志们批判。

## 目 录

何必说（代序）  
“历史的误会”  
脆弱的二元人物  
我和马克思主义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文人”  
告别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生命的末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年份来标了，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了。

但是，不幸我捲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责，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活。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紧，没有余裕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心上有不能自知（制）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得进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说几句，心上也说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瞿秋白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  
于苏州狱中

##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大，只愿能够攻读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渡过一生。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好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学，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又改普通文官考试，又没考上。结果是挑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去进修。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瞿生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成《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字典看俄国文学原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都放在文艺方面了。对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敬芳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

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学生运动正在替复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样热烈了。我就多读了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派通讯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地研究一下，这确实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业，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〇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苦包，餓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行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个月内，读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晨报的通讯，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章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为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方大学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是共产党员，还是时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来工作，我就同他回到北京。于佑仁、邓中夏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不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们说我去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兼看《共产党》月刊。编辑《共产党》“上大”初期，我还有余裕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办了国民

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于我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怆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叙述之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仍失掉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陈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对于领导已经不太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陈独秀就退出中央。在那时候，没有人主持，就轮到我去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和一九二七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叙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不願意自己去代替他们——至少是陈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思想陈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点，不叙述之的理论，苛求实逼此处，要我“取陈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适合”，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一月至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陈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完全由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样就感到空同无聊。但是，总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在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的主张的联带的课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精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势紧，旧干部中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式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人，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只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〇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路线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在召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的委员，新干部起来接管了政治上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上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像外间所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仔细想想，象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来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一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工作是“但求无过”的状态，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是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担负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是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格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梦。

我讲这些话，决不是要推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对国民党的“党同”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

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事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竟辜负了某共产党的领袖的声名。十年来，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个年的脚踏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长久感到一种无可形容的苦闷。精神上的政治上的怠倦，使我渴望甜密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神志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共产党的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确实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况，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满三十六岁（当然照随手的习惯说，我今年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从一九一九年我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的医疗的机会，肺结核的发病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救亡救国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结核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脆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切身体在床上不能行动，神昏智昏的几天以外——我的日子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带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连续十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弱和十分厉害的神志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尚

衰老的时候还很远，这十年的辛劳，确实称起也不能说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人了，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炼啊！

或者，这不仅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吧！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作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祖父瞿慶韶还在湖北布政司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前几十年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的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连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积欠了地几个月的工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我的绅士意识——就称是谋略，潜伏着，表面上不容易觉察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候，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就不能轻易就改变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國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如恹恹的仁

愿礼让避免斗争……以致产生出式的隐士思想，有时候还有真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份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思索。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两三个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过分的畸形的兴奋，以至于不能睡觉，脑疼……“冷汗”噢！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干吗？我想，假如我还保有这多余的生命若干的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由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结束了吧。

##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列世界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类的子书，随后是儒家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在列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了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谈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不知道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法：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有人找一种学问或文学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识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主义”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药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

共产主义的极终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产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极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因为这与我的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不同的之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要到达这样的极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级。为着要消灭国家，——是所谓组织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着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实现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的所谓辩证法——使我感觉很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些问题，就放下了手，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么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有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些书。谁知道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去研究文学，不久就空空手了。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到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到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过一遍，作为预备。其他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我第二次到俄国（一九二八—一九三〇），那是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論，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根本就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論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本十册子上记出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sup>不久</sup>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职，就逐渐地偷窃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根据几本外国书发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已经有许多转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sup>部分</sup>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sup>我记得</sup>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俊汉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那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以后，因为总在国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点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却不得不由我开始这个尝试。分析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一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次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是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论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  
(接下页)

治路线，以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〇年，我虽然在国际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觉得反而退步了。

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瞭的批判，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不想通甚至不想碰了。新的领导者选择某种议论之后，我会感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么简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以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考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了我的政治思想上的冻结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政策、理论都完全而深刻地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是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的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知识，曾经在当时起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亡，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切的。如果要同我谈一切种之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推论以外,却没有什麼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实在内,这是“并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了;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有力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和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 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

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入了最大规模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做了政治上时估计，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个阶级斗争更进一步的关头，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离开革命的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确的。武汉分共之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一九二七），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威胁南京国民党反共之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变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起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潮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东暴动失败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地存在，而且在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来的个别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了，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是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为，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

費力于枝节之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开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使政策跨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反时代以后,我们取得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在一开始就有首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地和土地革命联系起来等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规定下来。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时候我的观点中不仅有过量估计革命形势的开展以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以为富农还在革命阵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自觉这些观点的严重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批判)……所以,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时,就听说立三和忠实的政策有许多不适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内斗,觉得互相攻击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他们所说的却往往有些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行为,“打倒”对立的理由。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

不接

义和异己份子的庇护者。结果，取消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其回国。自然，在回国的任务之中，最重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同全党之间的派别观念对于党内全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有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〇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托洛茨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抑判莫斯科回国的老干部。而我回来之后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的一切处置，都是另外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路线错误，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观念——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的逻辑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的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实是自己没有把握保持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果区的胜利。党的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致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被迅速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的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中，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中，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尚在中国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中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像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着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可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下了千钧重担。我第三次回国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我几乎比五十年还要长。人的精神象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疗——实际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太迟了。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才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尽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干干“以度余年”的。可惜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停，耗费三年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的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负了一部分工作，虽然不必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加一切政策的最初讨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过问政治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反党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向一向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还记得做了几次政治错误的错误，但是现在就连内容也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调子——社会主义著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有什么和中央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总是立即“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搭了吧。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革命奋斗，为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如公事办了些，说奋斗实在太笨了。几年前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都绝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与责任倒是更加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杀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最公平的裁判。

“文人，便是文人”——这是清朝士大夫家说过的。的确，所谓“文人”是元朝的人。这并不是现代

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理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一一 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得一点，可是真没有老实的知识。正因为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小译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在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使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一一 真正的作家，你一定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括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吧，你可以做错误，但是也会纠正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识的为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抱有希望，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了什么。

“文人”是中央世纪残余和“遗产”—— 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十年二十年没有这种知识份子。

不幸我既已不能否认自己还是“文人”之中的一分子。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诗曲，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就是想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但很少，所以这些书到手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消闲的工具。究竟在那一种学问上，我有真正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得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弱的“婆姨”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弱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

加每一见解是动机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在哈林初次和我谈话时候，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二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者’就是‘也许’也难怪……”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怕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见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另外的意见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连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还没有人去来诘，甚至其势汹汹的大家认为还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滥波逃流，是这种女人的必然的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当然也是对的”，我们很懂得孔夫子的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末，不是认为“既然站布尔什维克的队里不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对方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境界是大家不要辩论，和气气的过日子，我有许多标本的“羽者的道路”——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固然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告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依靠吧，他们也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吧。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也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存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

但是我怨，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午台上的演员，倒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的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人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惫的躺着：“回家去吧！”“回家”去吧。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午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为什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笑游戏和做事的兴致总会有的，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他做好的时候，你也感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算术聪明，你会摆好说件“七巧板”，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愉快，正象在中学的时候，你解出了几道代数的难题似的，谁叫你并不预备作数学家。

不过扮演午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事”，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等到精力衰竭的时候，对于政治午台，实际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零碎，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出活的乏味。

本来的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不会有透彻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名词的化身，一切都带有一个名词，但是都没有意义。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改革，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龟蛇一切种的名词、概念、词藻，说时会说的，等到追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那就会感到模糊起来，对于实际生活景象是雾里看花，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

一笑，其实杨之却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是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  
的时候，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一辆汽车，或者配剂一付药方，办一个  
合作社，管一批货物或者管理一笔账目，再不然叫他办一个学校。……总之，  
无论那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去办苏淮区的教育。因此，在瑞金、宁都、兴国  
这一带的所谓“苏区”原来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  
刚开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创办业务小学，开办几个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如  
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  
没有相当的智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的，很愿意“回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  
细的试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三、四  
年来，农民的生活日常是完完全全的日常生活，他们究竟怎样的感觉，  
我曾去调查过一两次，一开始就没有“共同语言”，而且自己也觉得很难，所  
以终于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我带着比较精细的观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这  
年来我读一些中国的和西洋的文学名著，觉得有完整的印象，所以这些著  
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介绍了人生和社会，介绍了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  
“好人”、“坏人”或者“官僚”、“平民”、“富农”等。摆在面前的是有血有肉的  
个性的，虽然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我总，这也许是从“文  
人”进到真正的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波德抱着对文艺的爱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材料  
所征服，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算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的  
用功，只是乱七八糟的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许比了现在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  
境界，不至于深刻不出越轨的余地。我曾发表了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致  
歉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充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受开除呢？

现在我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多余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榻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够继续斗争了。解放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命，严重的说，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力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伙。如果不幸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后自白或真实的态度而被迫处死，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作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说给我处死的时候，有些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想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了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是太那了。因此，解放现在已囚在监狱里，虽然我想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给翻出不是当叛徒的。我痛恨我一个人而弄得屋名不家实，叫革命的同志把叛徒烈士都看成是不该做的。所以反正是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辜负烈士而死。

那到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了，告诉你们，我实质离开你们的队伍很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是个“女人”勉强在政治舞台上混了好几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结束结束我的革命，结果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痛苦和疲惫，而且因为我始终不能学会服自己的烈士意志，我终于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

那到了！亲爱的同志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到万分的厌倦，这疲倦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〇年初或是一九三〇年八九月间简直感觉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得，不管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我只想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是“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封信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后的信。那到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了，而不是我，我只想休息。

时间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结果。月巴多的东西——类似于艺术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读者”。

讲到仅有的——具体知识，那我就只有俄国文学吧。假如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学方面每字每句的基本酌着，也许不会“读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在创作和评论方面再重新开始得什么成就就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 告 别

一 狗管箱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语，“捉住了老鸦不树上作巢”，这算是始终作不成功的。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任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固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装饰，甚至早就埋伏了毁灭的祸害。这是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后报账的时候了。

你们去报账吧！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的前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那总归耗费了一些心力在我不感兴趣的政治上。进去的已经进去了，懊悔徒然增加今天的懊恼。在当兵说出队伍的，说完在当官说出去，而且越快越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苦亲爱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的这一切，那我总早该开除我的党籍。我是个脆弱的人物，敷衍、盲报、盲信、盲从，尤其重要的是空谈的渴望自己的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親愛的人是很少的兒子，而且除开我的之華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之華，我也总穿一“笑風”，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痛快的事，不但对于动手去揭别人的痛快，就是对子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夠揭穿。現在我丢掉了最後一层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应当祝贺我。

我常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睡觉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之“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感愤，然後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前进里踏着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提住老鸪在树上做巢”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个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親近的人，我曾很依傍地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很依傍着我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自已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对不起我这个親人，尤其是我精神上的懦弱，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願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吧！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梨、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囪，月亮和太阳似乎也比以前更明亮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了，剩下的只有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朋友配我的躯壳，我愿把他交给医学院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院和医院的实验室很缺乏这种科学实验工具，而我是多年的肺结核病者（从一九一九年的那次，我看我的肺部有许多斑痕，可是也说不出来精确的判断）何定先想出一张象形图把躯壳解剖开来，对照着照完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现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闭幕了。午台上空幻同工的，有什么留恋的也枉然了。好在得到是伟大的休息。还能躯壳也许不须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十年” 克伦斯基的“先遣”，屠格涅夫的“春潮”，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吴玉的“功业”，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告别了！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选自《逸闻》民国二十六年第十一期）

北京大学校书物理系、奔陵岛》战斗队翻印

北京外国语学院《狼脑天》战斗队再翻印